

◎ 蔡克骄 夏诗荷 著

浙东史学研究

知识产权出版社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成果

浙东史学研究

蔡克骄 夏诗荷 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

内容提要:

浙东,作为一个地理范围,清雍正《浙江通志》卷一是这样记载的:“元至正二十六年,置江浙等处行中书省,而两浙始以省称,领府九。明洪武九年,改浙江承宣布政使司。十五年割嘉兴、湖州二府属焉,领十一府。国朝因之,省会曰杭州,次嘉兴、次湖州,凡三府,在大江之右,是为浙西。次宁波、次绍兴、台州、金华、衢州、严州、温州、处州,凡八府,皆大江之左,是为浙东。”

自章学诚《文史通义》有专篇论述“浙东学术”以来,梁启超、钱穆、何炳松、陈训慈、金毓黻、刘节、杜维运、朱仲玉、叶建华等学者对浙东学术的精华“浙东史学”都有论及。上述学者的论述,或偏重于某一个时期,或着眼于浙东的某一个地区,或研究一两个重要学人。本书在上述各家看法的基础上,试图把浙东史学作为一个在一定区域内不断发展的史学流派进行研究,并概括其史学学术特点,以期说明它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

责任编辑:张宏强

封面设计:张 昊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浙东史学研究/蔡克骄,夏诗荷著.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10
ISBN 978-7-80247-561-8

I. 浙… II. ①蔡…②夏… III. 史学流派-研究-中国 IV. K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82002 号

浙东史学研究

ZHEDONG SHIXUE YANJIU

蔡克骄 夏诗荷 著

出版发行:知识产权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 1 号

网 址: <http://www.ipph.cn>

发行电话:010-82000893 82000860 转 8101

责编电话:010-82000860 转 8127

印 刷:知识产权出版社电子制印中心

开 本:880mm×1230mm 1/32

版 次: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字 数:300 千字

邮 编:100088

邮 箱:bjb@cnipr.com

传 真:010-82000893

责编邮箱:zhqthx@126.com

经 销: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

印 张:14.25

印 次: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6.00 元

ISBN 978-7-80247-561-8/K·041(270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浙东史学流派的形成	7
第一节 宋代以前浙东地区的史家与史著概述	7
第二节 两宋时期浙东学术文化的发展	15
第二章 南宋时期的浙东史学(上)	36
第一节 吕祖谦与金华学派	36
第二节 陈亮与永康学派	56
第三节 薛季宣、陈傅良的事功史学	69
第四节 叶适的史学思想	84
第三章 南宋时期的浙东史学(下)	100
第一节 陆游的《南唐书》	100
第二节 黄震的史学成就	106
第三节 王应麟的史学成就	116
第四节 胡三省《通鉴音注》	123
第五节 南宋时期其他史家与史著	135
第六节 南宋浙东学派的史学批评	139
第四章 元明时期的浙东史学	147
第一节 元至明初浙东史学的概况	147
第二节 王阳明与刘宗周的学术思想	170
第三节 胡应麟的史学成就	181
第四节 张岱的《石匱书》	197
第五章 清朝前期的浙东史学(上)	211
第一节 明末清初的社会背景与学风	211

第二节	黄宗羲与学案体学术史	224
第三节	万斯大、万斯同的经史之学	252
第四节	邵廷采的史学成就	270
第六章	清朝前期的浙东史学(下)	280
第一节	全祖望的史学成就	280
第二节	汪辉祖的史学成就	302
第三节	邵晋涵的史学成就	309
第四节	章学诚与《文史通义》	318
第五节	黄式三、黄以周的学术成就	352
第七章	晚清时期的浙东史学	360
第一节	清朝晚期的社会矛盾与维新思潮	360
第二节	宋恕、陈黻宸的史学思想	365
第三节	李慈铭的史学成就	375
第四节	蔡元培与陶成章的史学思想	384
第五节	章太炎的史学成就	387
第八章	浙东史学的特点与价值	400
第一节	浙东史学的成果	400
第二节	浙东史学的特点	409
第三节	近代以来对浙东史学的研究	431
主要参考文献		445
后 记		449

绪 论

自章学诚《文史通义》有专篇论述“浙东学术”以来,梁启超、钱穆、何炳松、陈训慈、金毓黻、刘节、杜维运、朱仲玉、叶建华等学者对浙东学术的精华“浙东史学”都有论及。但浙东史学作为一个学术范畴,至今尚未有大致统一的认识。上述学者的论述,或偏重于某一个时期,或着眼于浙东的某一个地区,或研究一两个重要学人。本书在上述各家看法的基础上,试图把浙东史学作为一个在一定区域内不断发展的史学流派进行研究,并概括其史学学术特点,以期说明它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

浙东,作为一个地理范围,清雍正《浙江通志》卷一是这样记载的:“元至正二十六年,置江浙等处行中书省,而两浙始以省称,领府九。明洪武九年,改浙江承宣布政使司。十五年割嘉兴、湖州二府属焉,领十一府。国朝因之,省会曰杭州,次嘉兴、次湖州,凡三府,在大江之右,是为浙西。次宁波、次绍兴、台州、金华、衢州、严州、温州、处州,凡八府,皆大江之左,是为浙东。”^①在这个地域范围内,自宋代以来出现了诸如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以杨简为代表的“四明学派”、以王守仁为代表的“姚江学派”以及黄宗羲开其先,万斯同、全祖望继其后的史学流派,这些派别历来被称作“浙学”、“浙东学派”。

① 这里指的江是钱塘江。



近人何炳松在《浙东学派渊源》一书中,主张给宋以来的浙江学术确定“一定的地点和名称”,他对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中所用的“浙学”、“婺学”、“永嘉之学”等说法并不满意,认为“这三个名词很不切当,因为前一个太泛,后两个太偏”,还是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所定的“浙东学术”四个字比较适当。并认为南宋以来的浙东学者多专究史学,所以不妨称为“浙东的史学”^①。何氏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还要注意到,各种名称的出现是与一定的历史时期相联系的。最早提出“浙学”的是朱熹。朱熹说:“江西之学只是禅。浙学却专是功利。”^②当时的永嘉学派、永康学派、金华学派在思想上相通,都讲求功利,与朱熹有较大的分歧,朱熹将它们统称为“浙学”。至明末清初,浙西顾炎武异军突起,与黄宗羲并称为开国儒宗。然“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③,浙学遂有“浙东”、“浙西”之分。首倡“浙东学派”的是黄宗羲,他在《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一文中说:“言浙东学派最多流弊,……凡海内之知学者,要皆东浙之所衣被也。今忘其衣被之功,徒訾其流弊之失,无乃刻乎?”^④及至有清一代,史学领域为浙东学派所独擅,如梁启超所言:“浙东学风,自梨洲(黄宗羲)、季野(万斯同)、谢山(全祖望)以至章实斋(章学诚),厘然自成一系统,而其贡献最大者实在史学。”^⑤故这一学派又被称之为“浙东史学”亦顺理成章。

诚然,“浙东学术”和“浙东史学”还是有差别的,“学术”的范围比史学大,并包含了史学。但浙东学术的精髓在于史学,这已是历代学者所公认的。浙东的学者既是理学家,又是史学家。朱熹所说的“浙学”,就是偏重在史学上说的。他说:“浙间学者推尊

① 何炳松:《浙东学派渊源》。

② 《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三。

③ 章学诚:《文史通议》内篇二《浙东学术》。

④ 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第一卷,齐鲁书社,1985年版,第177页。

⑤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史记》，以为先黄老，后《六经》，此自是太史谈之学。”^①他又说：“伯恭（吕祖谦）之学大概尊《史记》，不然则与陈同甫（陈亮）说不合。同甫之学正是如此。”^②章学诚说：“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③他又说：“南宋以来，浙东儒者，讲性命者，多攻史学，历有师承。宋明两朝，记载皆稿荟于浙东，史馆取为依据。”^④因此可以说，对浙东学派的研究离不开对浙东史学的研究，而浙东史学，又是有特定的学术思想所指导的史学。

从陈训慈 1931 年《清代浙东之史学》一文问世以来^⑤，“浙东史学”作为一个学术范畴进行研究，已被后来的学者所认同和接受，不少史学著作对浙东史学有专题介绍，一些学者开始注意它的源流。

何炳松认为浙东学术渊源于二程，特别是程颐。也有学者坚持章学诚的说法，认为是“宗陆而不悖于朱”，或认为兼有“中原文献之传”。基本上认为起源于宋代。

至于浙东史学流派的下限，各家的说法还不是很一致：

——晚清平步清氏给章学诚曾孙的信中说：“浙东学术，自东发（黄震）、深宁（王应麟）以来，远有代绪。国初黄南雷、万石园兄弟及邵念鲁、全谢山而下，唯令曾祖先生，远绍独肩。先生歿，而浙东学术不绝如线。”^⑥

——章炳麟在《检论》卷四《清儒》中说：“自明末有浙东之学。万斯大、斯同兄弟皆鄞人，师事余姚黄宗羲，称说《礼经》，杂陈汉、宋，而斯同独尊史法。其后余姚邵晋涵、鄞全祖望继之，尤善言明

① 《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二。

② 《宋元学案》卷五十二

③ 章学诚：《文史通议》内篇二《浙东学术》。

④ 《章氏遗书》卷十八《邵与桐别传》。

⑤ 该文 1933 年在中央大学《史学》杂志上发表时更名为《浙东史学管窥》。

⑥ 平步清：《樵隐昔癡》卷四《答章筱同书》。



末遗事。会稽章学诚为《文史》、《校雠》诸通义,以复歆、固之学,其卓约近《史通》。而说《礼》者羈縻不绝。定海黄式三传浙东学,始与皖南交通。其子以周作《礼书通故》,三代制度大定。唯浙江上下诸学说,亦至是完集云。”

——陈训慈《清代浙东之史学》一文,有“定海黄氏父子对古史之贡献”一个专节对章学诚之后的浙东史学加以论述。并在文中提到瑞安孙诒让亦在浙东范围,以及俞曲园、章太炎受黄宗羲的影响。

——杜维运在《清代史学与史家》一书中指出,南宋以来的浙东史学,为中国历史上最早之史学派,亦且为持续最久之史学派。迄至近代,浙东史学之脉未至全斩。

上述这些看法的提出,都各有一定的道理。笔者认为,作为学术思想,浙东学派各分支各有师承,《学案》已为其条缕分析。作为史学流派,浙东史学就其形成与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浙东史学形成于南宋。南宋时期,是浙东地区社会剧烈变动时期。政治上,朝廷偏安江南,国势飘摇,民族危机十分严重;经济上,商品经济有所发展,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受到冲击;学术上,学无统绪,理学家空谈性理,无法解决现实的政治经济问题。浙东学派的各个分支,永嘉学派、金华学派、永康学派,虽有不同的师承,但在同一时期、同一区域,面对同一社会问题,形成了在学术上有相同旨趣的流派。在外族入侵,民族危亡的时刻,叶适、陈亮、吕祖谦等浙东学者都积极参与政治,他们或伏阙上书,反对屈辱求和;或身临前线组织抗金,具有强烈的民族精神。在严峻的现实问题面前,他们反对理学家空谈心性义理,提出学术经世。他们经史兼治,注重历史研究,寓义理与史学,强调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为现实服务,完成了从心性义理之学到经制事功之学的转变。南宋是浙东史学的形成时期和第一个高峰期。



第二个阶段:清代前期是浙东史学的又一个高峰。南宋以后,朱熹的理学逐渐取得统治地位,影响整个意识形态领域。浙东学术的发展受到严重的影响,元明时期的浙东史学,虽有胡三省、宋濂等史学家的成就,但总体上看处于低谷时期,浙东史学流派的特色并不明显。及至明代中后期,王阳明崛起于姚江,泛滥诸家,归宿于“良知”之说,批判朱子理学的教条,主张经史合一,学术思想领域开始活跃起来。明末清初,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资本主义萌芽已有相当的发展,民族矛盾、阶级矛盾错综复杂。余姚黄宗羲师从王阳明弟子刘宗周,得王学之传,兼取各家之长,开创一代学风。他继承南宋浙东学术的事功传统,主张经世致用,把历史研究与当世之务结合起来,猛烈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在清朝统治者大兴文字狱的文化专制政策的高压下,黄宗羲以遗老自居,隐居讲学,故国之思,发之于史。清代浙东史学派的主要成员大多受王、刘、黄思想的影响。万斯大、万斯同兄弟便是黄宗羲的高足,万斯同以布衣领明史馆,独尊史法;全祖望私淑黄、万,奔走山海之间,搜讨遗音,表彰先哲;邵廷采亦尝问业于黄宗羲,尤善言明末遗事。清初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浙东学者,其治学思想既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社会经济的要求,又具有强烈的反清民族思想。至乾嘉时期,考据之学盛极一时,浙东仍有邵晋涵、章学诚出,继承黄宗羲之统系,形成浙东史学的第二个高峰。

浙东史学的第三个高峰是在20世纪初。甲午战败,亡国灭种的危机迫在眉睫,一批维新思想家登上历史舞台,希望清廷改革图强。维新运动虽然很快被顽固派扼杀了。但由此而开启的思想解放潮流却不可阻挡。至20世纪初,由于民族危机的刺激,革命思想的推动,西方新思想、新学说的输入,中国学术界出现了急剧变化的新局面。一批进步的思想家以史学为武器,用以分析历史与现实问题,寻找救国的道路。在浙江,温州宋恕、陈黻宸、孙诒让,



绍兴蔡元培,余杭章太炎^①等人,他们以杭州、上海为中心,过从甚密,或促膝相谈,或信件来往,学术旨趣,皆究心于史。上述诸人的史学思想,即继承浙东史学的传统,又体现了新时代的特征。他们主张维新变法、推翻清朝,积极投身政治运动,他们接受西学,猛烈批判封建专制制度,随着政治斗争的深入,他们的学术思想也不断演化,推动新史学思潮的发展,其中一些人成为我国早期资产阶级史学的代表。浙东史学此时又呈现出新的景象,成为当时“新史学”思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① 章太炎原籍余姚,世居余杭,尝自称余姚人。其思想感情、治学方法都与浙东学派相近,世人亦把他看作浙东人。

第一章 浙东史学流派的形成

第一节 宋代以前浙东地区的 史家与史著概述

汉唐时期,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黄河流域,浙江的文化不及中原之盛,人才也很稀少。而地处浙东的会稽郡,由于经济开发较早,在东汉时已“颇称多士”。东汉思想家王充曾热情赞颂“会稽人才”,称“会稽吴君高、周长生之辈位虽不至公卿,诚能知之囊橐,文雅之英雄”。他特别推荐的“君高之《越组录》、长生之《洞历》”,即浙东史学之滥觞。据历来学者的考证,《越组录》即《越绝书》,是浙东地区现存最早的史学著作。《洞历》已佚,内容已不得知,但据《论衡》介绍:“长生之才,非徒锐于牒牍也。作《洞历》十篇,上自黄帝,下至汉朝,锋芒毛发之事,莫不记载,与太史公《表》、《纪》相类似也。上通下达,故曰《洞历》。然则长生非徒文人,所谓鸿儒者也。”(《超奇》)可见《洞历》是一部内容丰富的编年体通史,可与司马迁的《史记》相媲美。

这一阶段,会稽郡的山阴、上虞、余姚等地,见之于记载的史家及史著还有东汉袁康、吴平的《越绝书》,赵晔的《吴越春秋》;东晋虞预的《晋书》、《诸虞传》、《会稽典录》,谢沈的《晋书》、《后汉书》、《汉书外传》;梁朝慧皎的《高僧传》;唐朝虞世南的《帝王略论》等。



一、王充与《论衡》

王充(27—99?)字仲任,会稽上虞人,东汉前期著名的思想家,著有《论衡》。据《论衡·自纪篇》和《后汉书·王充传》所记,王充出身“细族孤门”,自幼好学,八岁出书馆,家贫无书,常到书铺阅览。后赴洛阳入太学,曾师事大儒班彪,“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倡言“谢本师”而自成一说。因家贫而无法进入仕途,回归乡里,著书立说,历时30余年,写成《论衡》,全书20余万字,共85篇。

王充没有专门的史著,但在《论衡》一书里,他多次谈论史学和史家。郑先兴先生在《王充的史学理论》一文中作过统计,《论衡》里提到司马迁的地方有43处,提到班固的地方有10处,提到班彪的有7处,提到周长生的有5处,至于提到孔子的地方就更多了。^①王充的史学思想主要表现在他对史学功能的认识、历史进化观及史学批评上。

王充认为,史学的功能在于“载人之行,传人之名”。他说:“善人愿载,思勉为善,邪人恶载,力自禁载。然则文人之笔,劝善惩恶也。溢法所以章善,即以著恶也。加一字之溢,人犹劝惩,闻知之者,莫不自勉,况极笔墨之力,定善恶之实,言行毕载,文以千数,传流于世,成为丹青,故可尊也。”(《佚文篇》)自有《春秋》以来,史学的“惩恶劝善”功能已被孟子、司马迁等人作了充分的揭示。王充把自己的《论衡》与《春秋》相提并论,说:“《春秋》为汉制法,《论衡》为汉平说”(《须颂篇》)。

汉儒的古今观,主要承袭先秦孔、孟“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是古非今论,他们言必称“三代”,认为今不如昔。而王充在《论衡》的《宣汉》、《恢国》等篇中,从文明进化、疆域拓展、文治武功、

^① 郑先兴:《王充的史学理论》,《南都学坛》,1994年第5期。



修养仁德和瑞应显现等五个方面对汉朝与周朝的文明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比较之后,肯定的提出了“汉盛于周”的历史进化观点。^①正如李维武先生指出的:“只有到了王充,才把进化史观十分鲜明地凸显出来。”^②

王充生活在一个神学史观泛滥的时代。统治者在意识形态领域宣扬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唯心主义神学思想体系,谶纬迷信大肆流行。史学著作中充斥着阴阳五行、灾异符瑞、天人感应等神学思想。王充对史学领域中虚妄不实的史著——加以批判,《论衡》一书充满着辩虚崇实的内容,正如王充自己所言:“《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

叶建华先生认为:“王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批判历史学家;《论衡》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批判史学著作。”^③

二、《越绝书》及其作者

《越绝书》是记载春秋后期吴越两国争霸历史的著作。其来历比较复杂,关于它的作者、卷帙、书名,历来有不同的意见。^④今本《越绝书》十五卷,计内传四篇、内经二篇、外传十三篇,共十九篇。

首篇《外传本事》表明了该书宗旨:“当是之时,齐将伐鲁,孔子耻之,故子贡说齐以安鲁。子贡一出,乱齐破吴,兴晋强越,其后贤者辩士,见孔子作《春秋》而略吴、越,又见子贡与圣人相去不远,唇之与齿,表之与里,盖要其意,览史记而述其事也。”

可见该书是继孔子《春秋》而作,因为孔子作《春秋》而略吴

① 参见汪高鑫:《试论王充的历史发展观》,《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

② 李维武:《王充与中国文化》,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8页。

③ 叶建华:《王充与中国批判史学》,《浙江学刊》,1993年第5期。

④ 陈桥驿:《点校本〈越绝书〉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越,故决意览史记而述其事。其所述内容广泛,详细记载了吴越两国争霸、越王勾践生聚教训、最后兴越灭吴称霸中原的历史,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地理等各方面。它丰富的内容,可以补《春秋》、《左传》、《国语》、《史记》等书之不足。特别是其中关于发展生产、交通运输等经济方面的记载,为他书所无,尤为珍贵。

有关该书的作者,《隋书经籍志》、新旧《唐书经籍志》说是子贡所撰,宋《崇文书目》说子贡或子胥所撰,宋代目录学家陈振孙对此发生怀疑,他在《直斋书录解題》中说:“《越绝书》十六卷,无撰人名氏,相传为子贡者,非也。其书杂记吴越事,下及秦汉,直至建武二十八年,盖战国后人所为,而汉人又附益之耳。”

明代杨慎等人从该书末篇《篇叙外传记》中的隐语,解析出作者是东汉初年会稽人袁康、吴平,使问题的解决有了新的进展。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总结前人之说,以为定论:“不著撰人名氏,书中《吴地传》称勾践徙琅琊,到建武二十八年,凡五百六十七年,则后汉初人也。书末《叙外传记》以庾词隐其姓名,其云:‘以去为姓,得衣乃成’,是袁字也;‘厥名有米,覆之以庚’,是康字也;‘禹来东征,死葬其疆’,是会稽人也。又云‘文词属定,自于邦贤,以口为姓承之以天’,是吴字也;‘楚相屈原,与之同名’,是平字也。然则此书为会稽袁康所作,同郡吴平所定也。”

但此说在目前学术界仍有不同意见,陈桥驿先生、仓修良先生都曾撰文予以批评。^①

如果综合该书各篇的内容考察,还是可以获得有助于解决问题的信息:

首篇:“问曰:‘《越绝》谁所作?’‘吴越贤者所作也。当是之

^① 陈桥驿:《关于〈越绝书〉及其作者》,《杭州大学学报》,1979年第4期。仓修良:《袁康、吴平是历史人物吗?——论〈越绝书〉的作者》,收入《史家、史籍、史学》,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3月。



时,见夫子删《书》、作《春秋》、定王制,贤者嗟叹,决意览史记,成就其事。”

“问曰:‘或经或传,或内或外,何谓?’曰:‘经着,论其事;传者,道其意;外者,非一人所作,颇相覆载,或非其事,引类以托意。说之者见夫子删《诗》、《书》,就经《易》,亦知小艺之复重。又各辩士所述,不可断绝。小道不通,偏有所期。明说者不专,故删定复重,以为中外篇。’”

第三篇《吴地传》:“越王勾践徙琅琊,凡二百四十年,楚考烈王并越于琅琊。后四十余年,秦并楚,复后四年,汉并秦,到今二百四十二年。勾践徙琅琊到建武二十八年,凡五百六十七年。”^①

以上各篇所述,加以末篇隐语一起考察,或可得出该书为吴越先贤所作,非一人一时所作,及至东汉时为会稽托名袁康、吴平者所辑录删定的结论。

三、赵晔与《吴越春秋》

赵晔,字长君,生卒年不详,东汉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其生平《后汉书·儒林传》有记载:赵晔字长君,会稽山阴人,少尝为县吏,奉檄迎都邮。晔耻于厮役,遂弃车马去。到犍为资中,诣杜抚受《韩诗》,究竟其术,积二十年,绝问不还,家为发丧制服。抚卒乃归。州召补从事,不就。举有道,卒于家。晔著有《吴越春秋》、《诗细历神渊》。蔡邕至会稽,读《诗细》而叹息,以为长于《论衡》。邕还京师,传之,学者咸诵习焉。

据《后汉书·儒林传》记载,杜抚是《韩诗》博士薛汉之的知名弟子,后归乡里教授,门生达千人之众。中元二年应东平宪王刘苍辟召入京,建初中为公车令,卒于官。据此,可知赵晔离家不久,就随师入京,从师二十年,以致家中以为他已去世,为他发丧制服。

^① 建武为东汉光武帝年号。



杜抚卒后,转回山阴,不事官府而从事著述,书成之后,未及传播,死于家乡。从中元、建初年号可推知^①,赵晔生活在东汉前期,大约与王充为同时代人。

《吴越春秋》记载了春秋末年吴越两国相互争霸的历史,共六卷十篇,前五篇记吴事,称内传;后五篇记越事,称外传。从其体例上看,是纪传体和编年体相结合的史传体例。《隋书·经籍志》将该书列入“杂史”类。其《杂史序》曰:“自后汉以来,学者多撮钞旧史,自为一书,或出自人皇,或断自近代,亦各其制而体不经,又有委巷之说,迂怪荒诞,真虚莫测,然其大抵皆帝王之事。”

从史料看《吴越春秋》所记的史事大多在《国语》、《左传》、《史记》、《越绝书》中可以找到,但也增加了不少民间传说所述吴、越两国事较它书更为详尽,可补正史之不足。《吴越春秋》也很明显地具有许多非信史的特征,如《四库全书总目·叙录》所指出的:“其中如伍尚占甲子之日、时加于巳,范蠡占戊寅之日、时加日出,有‘蛇’‘青龙’之语;文种占阴画六阳画三,有‘元武’、‘天空’、‘天关’、‘天梁’、‘天一’、‘神光’诸名;皆非三代卜筮之法,未免多所附会,至于处女试剑、老人化猿、公孙圣三呼三应之类,尤近小说家言,然自是汉、晋间稗官杂记之体。”^②

但这并不影响其是“后世补亡之书”的价值。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引用《吴越春秋》的文字就多达十几则。元代徐天祐在《〈吴越春秋〉序》中说:“其言上稽天时,下测物变,明微推远,燎若蓍蔡。至于盛衰成败之迹,则彼已君臣反复上下其议论。种蠡诸大夫之谋迭用则霸,子胥之谏一不听则亡。皆凿凿然可以劝戒万世。岂独为是邦二千年故实哉!”^③

① 中元为东汉光武帝后期年号,建初为汉章帝年号。

② 《吴越春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62页。

③ 徐天祐:《〈吴越春秋〉序》,《吴越春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页。